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五七期 ——
(二〇一四年九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9a)

【亲历者言】	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	胡宗式
【拒绝遗忘】	谁是杀害殷文杰的元凶——质问胡宗式	史 正
【往事非烟】	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 (之二)	扬子浪
【史实辨析】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邱路光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亲历者言】

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

• 胡宗式 •

殷文杰是北大无线电系 62 级学生，北大井冈山兵团 15 纵“过大江战斗队”的成员，1968 年 4 月 27 日遇刺身亡。他的死完全是无辜的，是不幸的。

从 1968 年 3 月 29 日开始，北大校内的两派开始武斗，双方抢占一些重要的楼盘，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在 4 月 24 日前，井冈山兵团已经占领了 28、30、32、35、37 楼。35、36 楼是女生宿舍，36 楼在 35 楼和 37 楼之间。如果占领了 36 楼，井冈山兵团就可以把占领区连成一片，因此 36 楼的战略位置很重要。4 月 25 日，井冈山兵团采取突然袭击，把楼内新北大公社的人赶出去。4 月 26 日，新北大公社组织力量想夺回 36 楼。井冈山兵团把通往 2 层的楼梯用家具堵死，死守二层。由于井冈山方面居高临下，占据主动。新北大公社的人虽然进入了一层，但没有办法攻上二层。这次武斗，新北大公社吃了大亏，许多人受伤，气氛很是压抑。

27 日上午 10 点左右，殷文杰从他住的 42 楼出来（当时一些楼仍然是两派混住）从南向北走，当他经过新北大公社总部所在的 44 楼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

（“过大江战斗队”是对立派比较有名的战斗队。）新北大公社钢一连的杨恭谦和高玉堂（当时我不认识他们，名字是后来知道的），此时正拿着长矛在44楼门口，听到喊声，他们便拿着长矛跑上去拦住殷文杰，殷文杰转身向后跑。这时一人（可能是杨恭谦）上来用长矛刺殷文杰，接着另一人也上去刺。当时我与同组的章铎（生物系三年级女学生）正和人大“三红”动态组的盛学韞（人大的女教员）在附近谈话，距离事发地约20余米。当时44楼附近的人不多，我眼睛的余光看到殷文杰走过来，被拦住。见刺了第一枪后，我立刻跑过去进行拦阻。我一边用手抓住枪尖（枪尖对着我的肚子），一边喊：“不要！”我抓住了一个人的枪尖，但另一个人又刺，我又去抓他的枪尖。我和在场的章铎等人对此行径都非常愤怒，真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会那样疯狂。殷文杰身上被刺了许多枪后倒在地上，这时凶手停止了刺杀并喊了一声：“滚蛋”。殷文杰挣扎着爬起来，奔到44楼北面小树林里又倒下。此时我见他口吐白沫，呼吸困难。校医院离44楼很近，校医很快赶来了，给殷文杰打了一针强心针。随后众人把殷文杰抬上汽车（130型）。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黄元庄让我护送殷文杰到七机部721医院（五棵松附近）抢救。我怕汽车颠簸，就坐在车厢底板上，把殷文杰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一路上抱着殷的头。汽车走海淀直达五棵松的路，此路车少，又是最近距离。当时721医院是七机部的“915”掌权，和新北大公社的关系很好。

到了721医院，大夫一看瞳孔，立即抢救，先是按胸做人工呼吸，后作了开胸的心脏按摩。医生的技术很高，三刀就露出心脏。我在旁边看着，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盼望医生把殷文杰抢救过来。听到医生说“不行了”，我眼前一黑差点晕倒，护士把我扶到外边，让我坐在长椅子上。人刚送来时，我没有告诉医院殷文杰是对立面的，说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护士说：“这么凶残，把人扎成这样。”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午，我再去医院，对上午没有告诉殷文杰身份一事，向院方表示歉意。他们说：“医院有救死扶伤的义务，不计较他是哪一派的。七机部当时也面临武斗形势，尸体放在这里不安全，万一叫对立面知道不好办。你们尽快把尸体领回去。”我取回诊断书（上面写着39处伤口）。晚上我们把尸体拉回来，放在员工食堂后面的小屋里，第二天找了一些冰放在里面。

在新北大公社总部附近的马路上，黄元庄、我、保卫组的谢甲林商量给死者家属发电报的事情。谢说：“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家里一见死亡的电报，就会出个好歹，所以发电报不要说死。”28日上午发出电报，说是重伤（具体办的人是谁，记不得了）。原以为家属两天能来，黄元庄说：“家里来人在这里哭得死去活来，不好办。还是到火葬场去哭，然后火化。”

29日一大早，我、曹广志和后勤的蔡师傅送尸体到东郊火葬场。我们来得很早，比他们上班时间早一个多小时。在等待时，我翻看了前一天的火化记录，有60多人，正常死亡的约一半，非正常死亡的有车祸和自杀。我选了一个最贵的骨灰盒（200多元），从学校拿来一套新棉衣准备给殷文杰穿，好遮住他身上的血衣。曹广志见了死人非常害怕，不敢靠近，我让他到外面去，蔡师傅和我给殷文杰穿上衣服。停尸房里有个一小间，停放着两个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房里有冰。我们和火葬场管理员说好把殷的尸体先停在那里，等家属明天来。我们没有交冰钱，火葬场也没有要。30日中午，家属没有来。火葬场几次打电话催问，要火化。我打电话给上海殷文杰的家属，一是请他们来，二是尸体火化。起初家属（殷文杰的姐姐）不同意火化。我说“五一节”火葬场要清理，不给保留尸体了，你们要尸体没有什么用。后来家属同意了。我随即通知火葬场，火化尸体。大约过了2个小时左右，他姐夫来电话又说不同意火化。我告诉他已经通知火葬场火化了。

井冈山方面很快得到殷文杰死亡的信息，他们不能确定凶手是谁，便把矛头对准我，因为我可能是现场一般人能认识的人。他们在广播中说：“反革命小丑、杀人凶手胡宗式”。至此以后，为防意外，我一般不再外出。

事后新北大公社总部责成我、黄元庄、陶威信（教员，哪个系的不记得了）组成一个调查组来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我和黄元庄到“钢一连”（44楼2楼），把两个凶手找来。他们知道闯了大祸，很是懊悔。在44楼2楼找了一间屋子，和他们谈话，我让他们写过程和检查，材料写好后交给我。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两个人也写了材料（具体是谁，不记得了）。这些材料都作为附件，放在调查报告的档案袋中，留在公社总部，并一直留在学校。调查报告的草稿是我写的，经魏杞文修改后我又重抄了一遍，聂元梓在上面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我在聂元梓家里（佟府丙8号，在第二体育馆附近）说到抓凶手的问题，聂元梓同意抓。不久，在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和战斗团长的会议上（地点在临湖轩），聂元梓说：“关于殷文杰死亡一事，调查完毕了，大家看怎么处理。”只有一个团长说应该交出凶手，大多数人反对交出凶手。有的说：“我们不干了！让你们这些老爷去打吧！”等等。这样吵吵了一阵，没有结论就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

死者的哥哥殷文豪和他的表妹，5月中旬来校，他们先到井冈山兵团驻地，从那里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请他们从西校门进来，在办公楼的一间房子，我和黄元庄接待了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从派性出发，采用一些诡辩的方法来对待家属提的问题。殷文杰的哥哥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说：“你有你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又问：“是不是武斗中死的？”我说：“是在武斗的环境中死的。”家属追问凶手，我说正在追查中。家属来之前，我问黄元庄如何处理。黄说，多给家属一些钱。但是在和家属谈话的过程中，他们只是提抓凶手，不提赔偿问题，我也不好提此问题，家属只是拿出车票要求给报销。

我在处理殷文杰事件中，也想为凶手减轻一些罪责。我和凶手谈话时，高玉堂说：“我们叫他站住，他转身就跑。”我说：“你就说喊了一声站住。”这句话是否写在调查报告之中已不记得了。

1971年清查5·16时，军、工宣队把我押回学校审查。专案组以殷文杰事件为突破口对我施加压力。在审查时，我写的关于殷文杰事件的材料中，有两个细节和军、工宣队掌握的不一致：一是在4月30日我给上海打电话，与家属通话，说火化的事。由于火葬场多次来电话，说五一节前尸体要火化。我对家属说：“明天是五一节，火葬场不给保存尸体，你们要尸体没有什么用。”他姐姐同意了火化，而后来他姐夫又不同意火化。他姐夫给工宣队的证明中否定了家属曾同意火化。军、工宣队说我说的是假话；第二，是军、工宣队说送721医院前人已死，校医院的大夫给工宣队开的证明是这样的。可是同一大夫当时给我的证明是心跳微弱，当场还打了强心针，我是亲眼见的。在当时我也没有认为人已死。军、工宣队说人已死了，你们送医院是做样子。他们以这两件事为由，说我不老实、顽固，根本不许我在会场上讲话。我一开口，他们就说：“你还狡辩！”并强迫我承认我是杀人凶手。我说：“我是救人的！”专案组的李秀蕊（女，教员）说：“你是救人的？救人的，人怎么死了？”他们还要我承认聂元梓是杀人凶手，让我交待聂元梓、孙蓬一是如何指使的。专案组副组长庄逢源（教员）说：“杀人凶手难道就要亲手杀人吗？蒋介石亲手杀人吗？他是不是凶手？”我当然不能说蒋介石不是凶手。他们说：“包庇杀人凶手的就是凶手。”最后他们宣布：“你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这个问题算揭发，不算交待。别的问题你自己想想吧。”

搞殷文杰死亡问题，就是要在精神上打垮我，要我承认聂元梓、孙蓬一是幕后指使者。想在精神上打垮我之后，进一步要我承认我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这是把我押回学校的根本目的。我坚持我是救人的，聂元梓有领导责任，但没有策划、指使问题。

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杀害殷文杰的凶手，在1971年左右受到处理。对于杀人凶手，理应追究其责任。追究杀人凶手是个法律问题。我们在总结这些事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更应反思的是：在北大、在北京、

乃至全国，发生那么多迫害人、打死人事件，这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共产党教育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各种问题，分歧就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就是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把自己的同事、同学当作敌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宣传的层面上，根本没有民主、法制、人权的概念。殷文杰事件也是新北大公社的领导和群众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的例证。

□ 摘自：胡宗式新浪博客 2014.06.23

~~~~~

## 【拒绝遗忘】

谁是杀害殷文杰的元凶——质问胡宗式

• 史 正 •

一九六八年春夏，三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二十八日，是北大历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日子。以聂元梓为首的当权派校文革，指使其下属群众组织——新北大公社，妄图以武力镇压反聂的群众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发动了3.29武斗，从此拉开了北大四个月武斗的序幕。武斗期间，数百名师生不同程度受伤，无线电系殷文杰，地质地理系刘玮，北京地质学院附中温家驹三个青年学生，惨遭新北大公社杀害。其残忍，其惨酷，令人发指。虽然时隔四十余年，淋漓的鲜血已凝成黑褐的血痕，但人命关天，死去的冤魂常在我们耳际呼号，不彻底调查真相，从法律和道义上惩处债主，这些冤魂便永远无法安宁！

新北大公社核心人物，参与刺杀殷文杰并处理后事全过程的胡宗式，如今年逾古稀，在殷文杰冤魂的呼号面前，定然也不得安宁。他一生都无法逃避殷文杰冤魂的追讨，他更担心在他百年之后，人们将他与殷文杰之死的罪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写入万劫不复的历史。因此，在他的个人博客之中贴出了名之谓《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一文。

此文披露了殷文杰被刺39枪的细节，披露了两个凶手的名字——新北大公社钢一连杨恭谦、高玉堂，披露了刺杀的部分过程与后事处理的一些过程，较之原先聂元梓与新北大公社的知情人有意躲闪和回避殷文杰之死，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十分有限，明眼人不难看出文章的本意不是在反省忏悔，而是怀有两个目的：一是替自己洗刷开脱，他无罪而且有功。二是替聂元梓洗刷开脱，聂没有“指使和策划问题”，仅仅是“领导责任”。

胡宗式在文章的开头，便有意掩饰历史真相，即聂元梓掌控的新北大公社，经过精心策划，于1968年3月29日，打响了北大武斗的第一枪，攻占了31楼，刺伤并撵走了楼内的许多井冈山派成员，一些人被逼跳楼受伤。他们试图效仿上海工总司镇压上柴联司的行动，行使武力摧垮对立的群众团体，以实现北大的一统天下。自此，北大大乱，人心惶惶，动荡不安，矛盾激化，血泪交加。井冈山组织为了活命，为了自保，也自制长矛，据楼自卫。1968年4月26日主动占据了咽喉要道36楼，将28、30、32、35、36、37楼连成了一片，从而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出口通道——维持了自己的一线生机。新北大公社则包围了这6座楼，占据了校园的绝大部分楼舍与广大的空间，对井冈山同学构成了莫大的生命威胁，一攻一守，截然分明。显然，新北大公社处于强势，井冈山兵团处于弱势，36楼被井冈山占领，只给自己一线生机，而并未对公社构成威胁，未能改变公社包围井冈山的强势局面。面对这种巨大的强弱反差，井冈山大部分成员，迫于人身安全的威胁，纷纷逃离北大。殷文杰是个井冈山内极为普通的同学，他虽然认同井冈山观点，是班内井冈山一个普通战斗队“过大江”的成员，但从参与井冈山的活动，更不参加武斗。他以己之良善之心，对新北大公社未有丝毫提防，路经公社防区，办理有关事项，准备离校返家，未料遭到公社人员如此凶残的杀害。

那么，即使回到胡宗式所言的“武斗环境”，殷文杰又何罪之有？杀人者又理在哪里？只能说明，公社中的一些人，在派性的蛊惑下已丧失了起码的人性，而不是其它。聂孙们早在“四·二六”之前就已开始杀人。他们驻第二体育馆的武斗连就打死了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温死后，孙蓬一面布置所谓调查，一面扬言：“你们不要怕，有校文革顶着。”（《北京大学大事记》下册670页）他们依仗炙手可热的大红伞聂元梓，狂热鼓动“反聂即反动”的政治逻辑，顺聂者昌，逆聂者亡，对反聂的群众组织视如寇仇，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推行了血腥镇压的方针路线，蓄意鼓动“国共两党之争”的政治仇恨，致使某些公社成员忘乎所以，无所顾忌，才使无辜的殷文杰成了他们的矛下之鬼。胡氏文章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有意模糊北大当时的政治、武斗形势，企图把殷文杰之死推卸给井冈山兵团为自卫而占据36楼上。时隔四十年后，胡的派性立场仍然十分顽固，并开设博客，四处宣扬当时的派性观点，为聂元梓鸣冤叫屈，这在北大公社的成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的胡宗式，尚且如此坚持顽固的派性立场，那么当时的胡宗式的派性便可想而知了。因而，胡在文章中谓自己冒着枪尖出面拦阻杀人凶手，便难以让人置信。胡是公社的核心人物，聂元梓的心腹，掌管校内外的动态情报，与校内外天派组织有着密切的交往。正如他自己在文章所述，他是“现场一般人能认识的人”。那么，既然是公社这样显赫的人物，倘出面拦阻，岂有阻拦不住之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吆喝，凶手们便兽性勃起，举起长矛杀将过来，而公社要人胡宗式“非常愤怒”并自谓“出面进行拦阻”，却不起任何作用，这在逻辑上能讲得通吗？胡宗式能够自圆其说吗？当时井冈山的广播台和后来的工军宣队专案组曾认定胡宗式是杀人凶手，看来不是空穴来风。大概，殷文杰的阴魂始终在纠缠着他，他始终不能为此释然于心，想辩白，想洗刷，谁知，他越洗越黑，越辩白越让人怀疑。殷文杰血淋淋的39个枪眼，难道仅仅是胡宗式抛出来的钢一连的杨恭谦、高玉堂两人所为吗？要知道，这是在杀人，在杀一个活人，不是剁白菜，即使是剁白菜，39个眼也得剁一阵功夫。何以“救人”的胡宗式便如此无所作为呢？工军宣传队专案组，不仅调查了胡宗式、调查了杨恭谦、高玉堂，而且还调查了参与其中的一个女同学，身在现场的胡宗式，替公社执笔撰写杀人报告的胡宗式，为何对她隐而不报呢？

之后，胡宗式们对殷文杰的所谓“抢救”亦让人怀疑。即便如胡所说，殷文杰此时尚有一口气，那么北大附近的中关村、海淀，有许多医院，胡为什么舍近求远，不送附近医院，却要远送五棵松附件的七机部721医院。胡谓“当时721的医院是七机部的‘九一五’掌权，和新北大公社的关系很好。”关系好又如何，是否想营私舞弊，想隐瞒些什么，干些什么勾当？显然，他们把殷文杰送721的医院，主旨不是抢救他的性命，而是妄图掩饰自身的罪恶。胡宗式行文躲躲闪闪，却是不打自招罢了！

聂元梓对刺杀殷文杰持什么态度？她只是在调查报告上面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这不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又是什么？不是“认真调查”了吗，抓住两个凶手了吗？那么作何处理呢，一句空话，不作任何处理。所谓公社团长会上许多人反对，正中丁了聂元梓的下怀。聂是北大武斗之帅，是殷文杰之死的根源所在，杀人凶手只是其麾下打手而已！让她自己惩治自己的打手，岂非自残手足，她能做得到吗？

胡宗式也不得不承认：“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但他却不进行自我反省，追寻杀人者和准杀人者的个人责任与思想根源，却将这一问题大而化之，推而广之：“在北大、北京，乃至全国，发生那么多迫害人、打死人事件，这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共产党教育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各种问题，分歧就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就是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把自己的同事、同学当作敌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宣传的层面上，根本没有民主、法制、人权的概念。殷文

杰事件也是新北大公社领导和群众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的例证。”

固然，“文革”恶果，是共产党一度推行的极左路线所致。只是，党内自始至终存在着正确思想与健康力量，与民主、法制、人权、人性相一致，与广大人民群众良心道义相一致。同样，社会中的横暴恶行，人性之中的恶则是极左思潮的社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派性”，是社会两种思想道德倾向错综复杂的反映，是党内两种思想倾向斗争在社会上的反映。时过境迁，尘埃落定，民主与专制，善与恶，兽性与人性已逐渐明朗。“文革”是非不能统统以“派性”一词了结，个中杀人罪恶，尤其是杀害手无寸铁者的暴行，不能不谴责，不能不追究！即使在如此汹涌的“文革”大潮中，杀人者毕竟是极少数，人性的良知存在广大群众的心中，人命不是草芥，不可随意杀戮。在人命问题上，个人与个人所在的组织，必须负起责任，不能一味推卸给共产党的错误路线，推给党的整体，更不能以“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轻描淡写之。聂元梓在北大“文革”中干了许多坏事，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上推下卸，上推毛泽东与中央文革，下推新北大公社，就是不反省个人的责任。“讲义气”的胡宗式也吸取了聂的做法，只是略有变化而已。他上推共产党，而下卸两个杀人凶手，并以此开脱他所忠诚的聂老佛爷与他本人的罪过，想以此掩耳盗铃，模糊历史的真相，这能做得吗？殷文杰的阴魂能答应吗？殷文杰的亲属与同学能答应吗？

胡宗式同学，请你放下包袱，丢弃幻想，诚恳老实地回顾与反思殷文杰之死这桩历史公案吧！否则，只能愈描愈黑，自食孽果！

~~~~~

【往事非烟】

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日记（之二）

• 扬子浪 •

（前言见本刊 z k 1 4 0 8 c）

（日记正文上接本刊 z k 1 4 0 8 c）

一九六六年

1 0 月 1 日

今年的国庆游行一片红，人手一份主席语录，汇成了红色的巨流，流过了天安门广场，晚上北大联欢。

1 0 月 2 日

晚上看电影，《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和《毛主席第二，三次会见革命小将》。
我们伟大的领袖真是和亿万人民心连心啊！

1 0 月 3 日

到阳泉公社白家峒大队去劳动。

1 0 月 6 日

晚上我们接到了消息听说，北大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搬开聂元梓，全校轰动。当时同学们都议论纷纷，认为这是件大事情。我当时表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贴了大字报而已，闹不大，但心里还是不敢断定形势将会怎么发展。

10月7日

早晨文光理，潘世俊去学校观看形势，中午回来带回一叠大字报，一时大哗，同学们纷纷打背包，嚷着要造反回去。潘世俊大力支持，向世明一时拦不住，眼睁睁的看着都走了。只留下我，胡克定、向世明三人未走。当时心里十分乱，左右犹豫，前后思忖，难下决策。我还背着行李在公路上走了两站路，最后却又转回来了，优柔寡断到了绝顶，呜呼，难道真像胡克定说的一个没有出息的人。

晚上总算回来了，真是没有出息！学校里情况有些变化，革命真是不容易啊！北大的运动经过了多少曲折。

10月12日

好久没记日记了。

上午开讨论会，火药味很浓，差一点与文光理崩了。他是个能人，很有些斗争策略。不过我还是不赞同他的观点。文化大革命是触及灵魂的，世界观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了。首先是思想、是原则然后才是方法策略。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办事要大方一点，手臂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主义，实际上毫无用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

10月13日

今天忙了一天，反复思考终于写成了大字报“两种方针，两个前途——学习林彪最近关于学习毛著指示的体会和心得”，我认为我的大字报是深刻的，可反应却十分冷淡。

10月14日

力四流体解散了，无事干，今天读了一天列宁的书（哲学著作）把我的脑子都涨大了。

10月16日

下午会见李玉胜，顾志华要走了，我们班的同学也要走了，心里很乱，又想走了，上次回来的太快了，失算！我努力争取再出去串联。

10月17日

经过一天的奔波到晚上我与卫益俊搞到了5张票，两张去济南的，三张去郑州，但苦于系里不肯开介绍信，车票的全程又很短，因此，一时难于决定是否离开。但一想到外面的天地广阔得很，因此就走了。

晚上混上了5次特快（国际联运列车），36小时到达了桂林。路上检票一次，被列车长发现了，虽然没有什么惊人的后果，只不过解释一下，听了几句话而已。但心里总觉得不快，理亏，缺乏正义感，这种不快感几乎持续了整整一天。

桂林山水甲天下，今天只不过窥其一斑。登上了广西师院内的独秀峰和车站附近的南溪山，深感桂林山水之奇秘，诡异，千变万化，大自然的魔力震撼人心。

桂林山水这样千奇百怪，科学的原因是科斯特。

10月20日

桂林市在一场大风暴后显得很平静，我们带来的“林彪讲话”受到很大欢迎。

10月23日

22日中午乘665次列车离开桂林去贵阳，中午到达贵阳，云贵高原的名城。

晚上在邮电综合大楼广场召开大会“贵州日报第一次检查批评大会”。贵阳市中心中华路一带人山人海，炮轰派，保卫派在那儿狂呼口号，情绪十分热烈。看来贵阳六十万市民都卷进这

次大漩涡中去了。

10月24日

上午去贵阳医学院。路上与一工人谈话，他对贵阳市委镇压学生镇压群众的行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听说贵阳有许多工厂私设监牢，关押有不同观点的人。

贵州的革命左派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如今贵阳市人民得到了大发动。晚上盲童学校的盲童左右相连，前后搀扶也上街游行。举着红旗，主席像，拿着盲文的毛主席著作，高呼“火烧省市委，炮轰西南局”，两旁路人看了莫不为之感动。工人，家属，妇女，那些“炮轰派”，那些“狂民徒”，背着孩子，抱着孩子，狂呼“省市委有问题，大方向错误的”。历史上有这样的革命吗？不用革命两个字能解释这些狂热吗？这就是人生之所以如此壮丽的秘诀！真谛！

10月25日

早上离开贵阳，本来想在遵义下，但因车挤，只好作罢，过遵义而不入想怕会是终生的遗憾了。

10月28日

到重庆已经两天了，昼夜忙于搞车票、船票无暇他顾，至今日方得喘息。

重庆是个山城，市政建设别具特色，长江与嘉陵江在市中心汇合，景色十分壮丽。今天参观了“中美合作所”，红岩村，虽然搞得精疲力尽，但收获十分大。实地参观比读书要深刻得多了。

10月29日

上午在重大与遵义卫生学校的两位同学座谈了。鼓励他们回学校大胆造反，不怕打击，不怕扣帽子，不怕挨打，与无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到底！

重大“八一五”过去是左派，但今后是否永远是左派呢？我将拭目以待。

10月30日

今天重庆和首都七个革命群众组织召开的彻底揭发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重庆市中心大田湾体育场隆重召开。成千上万革命师生参加了大会，清早革命师生就从四面八方唱着歌呼着口号向体育场集中，市内交通阻塞。大会11点正式开始，直到晚上6点结束，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大中小学生高呼“坚决要求改组重庆市委”，“八一五好得很”等口号，群情激昂。路旁挤满了围看的群众，一些老年人露出茫然莫解的神色，显然他们不能理解这一大革命。

重庆后字242部队六同志贴出了揭发重庆警备司令部的大字报“警备司令部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帮凶”，“警备司令部的政委好凶啊！”影响很大。

10月31日

今天搞到了船票，十分高兴。重庆的几天将是惨淡经营，“凄风苦雨”，十分贫寒的生活，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金钱。

11月1日

今天去重庆南温泉洗澡，游泳。室内的一个游泳池水较热，室外的一个刚够个温字。据重大一位同学讲：重庆三泉，南泉最小，温度也很低；西泉最热，相距约两百多里地，过去为宋美龄、宋庆龄两姐妹霸占，现在人人可去了；北泉较大，温度也比南泉高，风景特好。其实南泉附近风景也不错，仙女幽岩，悬崖飞泉，九级“瀑布”等听说共有12景。重庆的同学说：“北碚是重庆的风景区，西南师院在北碚，我到过上海、北京、南京、武汉、长沙、等地的大学，全国约要数这个学院风景最好了！”明天一早就要走了，要不，去一次北碚，还是很不错的。

11月2日

早上七点登上了“驳8—157”船，9点半了驳船与东风八号帮在一起就起航了，船上人很挤，设备也比较差，生活有些困难。但在长江行船，站在甲板上，极目楚天舒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岸景色变幻无常，江风挟带着浪沫化作的水汽迎面吹来，十分凉爽，沁人肺腑，也足以慰藉了。风景，世界上的景色有两种。一种是“假的风景”，实际上充其量只能算盆景，例苏州的园林，北京的颐和园，上海的豫园诸如此类。还有一种是真正的风景，大王之风浩荡而来，万里长城绵延曲折、回转起伏，穿越了北中国的崇山峻岭；浩浩长江奔腾向东，水天一色，茫茫无边；登泰山而小天下，看清晨东海波涛托出灿烂夺目的红日，如此等等。我酷爱“风景”，这才显示祖国母亲真正的面貌和性格。江山如此多娇，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每当我面临如此大好江山时，胸中豪情顿时百丈，浑身充满了战斗的力量、生活的勇气。而那些精雕细琢的“盆景”，虽然有时也引我留恋，但是使人优闲、消磨人的斗志，绝不能激起心灵的狂飙。

我想长江三峡也是大王风，浩荡荡的风景吧！我期待着三峡。

11月3日

昨晚在万县市船泊了三个小时。我也上岸一游，码头上挤满了人，简陋的乐队慢吞吞的奏着乐，欢迎赴京归来的革命师生。万县有15万人口，很热闹，码头旁几家饮食店通宵营业，人来人往，生意兴隆。万县的东西很相宜，只是余财源枯竭，唯能望货兴叹了。

清晨三点从万县驶出，早晨7点半到奉节古城，过白帝城就到了瞿塘峡了。瞿塘峡最为陡峭，巫峡长而崎岖，西陵峡断断续续就无甚特色了。在三峡行船像在深谷平湖驶船，上是阴沉沉的天，下是奔腾咆哮的急流，前后左右皆是高山峭壁，环顾四处茫茫然，俨然与世隔绝了。往前看山重水复不知滚滚长江何处去，往后看峰回路转不知滚滚长江何处来。回忆起长江入海那是何等的气魄，何等的壮阔，雍容落落大方。而三峡的长江却受尽了委屈，如此狭窄，暴跳如雷，水回浪复，卷着无数的漩涡，才挣扎着挤出峡谷。同是一条长江竟有如此变化！我竟然有些受不了。

我期待着变化，我要争取变化，我也要像长江一样，从祖国大地母亲的躯体上吸取营养，不断充实自己。那管前面有多少高山峻岭，我也要冲出去，挤过去。哪管前面有多少曲折反复，我也要前进、要向海洋，唯有如此才能达到扬子江奔泻入海的气魄。才能这样广阔，这样深厚、这样雄壮，这样从容，这样席卷一切。才能以自己的血液来滋润祖国大地，我的名字就是扬子江，我是何等的热爱长江、羡慕长江啊！

下午三点钟到宜昌，即出三峡，从此长江就流入平原了，茫茫无际。到宜昌走了648公里，还有722公里，一半路都没有走到。

李白有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李白也太浪漫了，白帝山又矮又小，无甚彩云，从白帝至江陵也算得千里，但我行一日尚未到，李白那个轻舟就能一日回家了吗？两岸猿猴一声未啼，东风八号缓缓而行，哪会有“猿啼一声船过万山”的景象呢？李白也太悠闲了，太无聊了。

晚上八点半到枝城，荆江（长江的一段）大桥正在日夜修建，江上灯火辉煌船舶繁多，工程进行得很紧张。将来的川汉线就要通过这里。第三个五年计划正在我国加速进行！

11月5日

昨晚11点余到达汉口。

11月6日

卫益俊病倒了，身体不好，情绪也坏。看开来我根本不关心同志，我们处的不好，再加上他病了，我做了些密切关心的尝试都不受欢迎，我心里十分不安。今天去东湖看了一下，东湖是绿色的，一切皆绿，青山绿水，蓝色的琉璃瓦，碧绿的芳草，苍绿的松柏，只是梧桐树由绿变黄了。秋天来临了！

11月8日

今天我也病倒了，咽喉充血，扁桃腺发炎。亏得医生帮忙，我们才搞到一张10号的票，听说车挤极了，各种流言让人目瞪口呆。

11月10日

这几天干了许多糊涂事，9日晚12时卫益俊发了一封电报，原文是“急病于汉口十九女中请汇款，怒罪俊加”。在电文纸上加了“请勿删改”四个字，在发电时营业员修改，我允许改成“急病需款请电汇至武汉十九女中请转北大怒罪俊加”，当晚还给班里同学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卫益俊病情和我们在武汉的困难处境，请求帮助（汇助学金，介绍信）。第二天卫得知此事后震怒，破口大骂改电报的营业员懂个鸡巴！他病了，我应该原谅他，再说我改他电报本来就无理。但是我太狭隘了，我当时想不开满肚子不高兴。就一个人装着一脑袋苦闷出来散步，路过红汉路邮电支局，灵机一动，突然进去打了一个电报给力四流体班，电文是“我9日来信作废‘请勿拆’”出来时才觉轻松一些。同天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请求电汇。我二十年未打电报，两天之内却打了三个电报，也算一件奇事，卫对我的作为颇有些不满，说我的思想方法不可理解。这几天卫高烧39度。

11月12日

今天接到家里寄来的钱，二十块。

11月13日

今天进了汉口车站，想去广州，但人多极了，经过汉口开往北京，广州的车一概挤满了人，我好不容易跳窗上了去北京的车，但后来知“挤”而下了，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挤的车了，铁路上秩序很乱。

11月15日

我发现我的思想极不稳定，特别在关键时刻经常左右不决，踌躇犹豫，缺乏果断精神，却经常不断的后悔。我常常庸俗地害怕麻烦人家，害怕干扰人家，害怕造成别人的不快与不安，更谈不上必要时给一些人以打击和损害了，我缺乏战斗精神，怕这怕那谨小慎微，怎么能成为战士呢？我应该重新回忆与分析“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在新的意义上理解它。我应不怕孤立，不怕围攻，走战斗的道路。至于对一些人的议论纷纷，白眼，不快的谈话更应该付之一笑了。我一定要政治挂帅，把我的精神境界推向更高的阶段，更加政治化，战斗化。

11月17日

整天为船票奔走，终于搞到了今晚18点的票，今晨卫去武汉车站上车，从此我俩就分道扬镳了。

11月18日

船上结识了很多新同学，都相当有意思，船上的生活充满了诗意。早晨太阳从船前方升起，金色的阳光在船左首铺下一条光芒灿烂的大道，通向水天相接的远方。轮船激起的波浪，把近旁的木船颠得七上八下，惹得船上的乘客担惊的叫唤着。船尾四五只鱼鹰来回盘旋，一会儿踩着水面飞行，一会儿却傍着桅杆滑过，宽宽的翅膀缓缓地拍动着，来回寻觅着从船上抛下的剩菜残渣。江风吹来，把船舷挡风的帆布吹得啪啪作响，人们依着栏杆三三两两的谈话，或独自眺望着在地平线处依稀可见的两岸景色。风拂动衣角，扬起头发也叩击着人们的心弦。大江东流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浪淘沙兮风飘絮…，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长江啊！你负着千万大小船只，灌溉着几百万亩的沃野，推动着巨大的水轮机，可你又寄托着多少有志之士的豪迈理想，多少长存天地与日月同昭的感情，且也溶解了多少无味的叹息，和日夜情人间低低的

私语。

扬子，扬子！你难道不是一条思想的长河吗？你难道不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吗？对着长江我百看不厌，百思不解，长江，我真想用你的急浪来沐浴我的躯体，洗涤我的思想。总有一天，终有一天，我会有机会跳进涛涛长江，去弄潮击浪。会有一天的，会有这一天我将在历史的长河上激起浪花！

11月19日

昨晚晚11点到南京，听南京上来的同学说18日上午张贴了国务院决定，11月21日暂停串联，明年四月一日，春暖花开之日再行串联。

11月20日

昨晚到了上海，大上海依旧是那样喧腾，嘈杂。

11月22日

去师大，得知聂元梓同志已到了上海来进行革命串联，上海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相当顽固的。20日见了企成一面，他很矜持，苟于言笑，心情好像不怎么开朗了。

11月23日

拉稀，无奈只好在家休息。

读魏钢焰的《灯海曲》，联想起串联途中的生活颇有同感，抄诗几首于下：

草叶上的诗

如果你拆开我寄来的诗稿，
却只看见一片绿色的草叶
别惊讶吧，朋友，
它，就是我的诗！

青海湖呵，
层层白浪滚卷，
似千百匹烈马，
振摇着白色的长鬃，
奔扑而来。

从昆仑山巅飞来刚劲的风，
他巨大的翅膀拍打湖面，
青海湖昂头高吼，
怒浪四溅！

呵，青海湖！
谁知道你深深的湖底，
蕴藏着多少语言？
那翻腾不息的浪花呵，
可是你灵魂的波澜？

从你层层白浪上，
我看见五千年古国的历史，

一页页飞快翻过，
我知道呵，在你猛烈起伏的胸膛下，
是我们民族的心跃动！

你推起层层波浪——
羊群奔跑在草原；
你用手撩拨海水——
晶莹的盐粒闪闪；
你敞开宽阔的胸膛——
柴达木的油海一片。

你向我哟，
喷发出芳香的气息：
醉人的油香，
鲜冽的海盐香，
浓郁的草原香……

从岸边我摘下一片草叶，
久久地浸在你的胸里，
我相信他能把这一切
都渗入它的脉络！

呵，朋友
你从这小小的草叶上，
怎会看不到我的诗歌？

写水写得多么好啊！？

长江

这是长江？
水色苍苍，
烟雨茫茫…

我梦中的你啊，
可不是这个扮相！
绿得心醉，
清得眼亮；
望你一眼嘛，
连石头也要歌唱！

这是长江！
烟雨茫茫，
水色苍苍，
你
正该是这个模样！

你饮过战马呵，
磨过刀枪；
你怎能头戴翡翠，
满身异香！

呵，长江！
我在你身上，
也闻到黄河的土 气！

1 1 月 2 5 日

一天之内翻完《金陵春梦》第一、二部，获得大量历史资料，历史知识，得益匪浅。但作者“唐人”毫无马列主义常识，漠然无视阶级斗争，津津有味地大写私人生活，大写国民党内饿狗于饱狗，大狗与小狗之间的斗争。作者的立场是国名党内在野派，地方势力的立场、观点。

聂元梓二十一日到上海，二十二日在文化广场大会讲话，表示要彻底批判以曹获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她讲话的不够策略表示遗憾，但是我相信某些人高叫着要打到聂元梓，这是保常派以攻为守的策略罢了。

在交大看到“毛主席诗词十八首（未发表）”，心存 疑团，未敢抄。

1 1 月 2 8 日

回到北京，北京啊！我心中最神圣、最可亲、最怀念的地方。你比任何时候都要美丽，比任何城市都来得壮丽。

1 2 月 1 日

成都大学一位女同学来访，长谈两个多小时，像所有的四川人一样她十分健谈，相当泼辣，没有丝毫扭捏之态，谈吐相当直爽，只是像通常的红卫兵领导人一样，她略微有些狂妄，但这种狂妄也不怎样令人不快。

1 2 月 3 日

今天在大馆借到了《西行漫记》，欣喜若狂，整整看了一天，连通常的下午锻炼都没进行。

我回来还是早了，要在杭州、无锡、南京，稍作停留，一定美妙多了；甚至徐州也可以下来看看淮海战役纪念碑，曲阜去看孔庙，泰安登泰山。

1 2 月 5 日

今天在西山作了一次试探性步行。早上乘了 3 3 路车到香山，从香山走到卧佛寺往西至樱桃沟，进寿安山，沟内泉水淙淙，沿沟而上，发现源自一石下，源旁有一峰名白鹿峰。

从樱桃沟出来，已经十点半了，沿着西北山麓 的公路往南走，整整三个半小时，走到了八大处。八大处内八个寺院的菩萨已经一概搬走了，只留下八座空空的院落。我与几个小朋友兴致勃勃登上了八大处后的虎头山顶，在山峰上俯瞰了石景山区的雄伟景象。虎头山比“鬼见愁”矮，但两座山峰却一样险峻，严格来说虎头山比“鬼见愁”更要让人发愁。

下午四时许下山回家，在行人稀少公路上整整走到七点才到黄庄。这时我实在忍耐不了啦，下午一二点时脚就扭了，现在两个大腿都又酸又疼，如果停下来休息的话，一定早就不能走了。在井板村上了 3 4 路，白石桥下，换 3 2 路，两个车站间一百来步路却也费了我好大的劲。今天我的确使我的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疲劳程度，步行串联谈何容易。

1 2 月 7 日

昨天下午乘车到温泉游览，温泉黑山石旁高立着一座纪念塔，是民国二十五年有名的基督

将军冯玉祥立的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纪念碑。塔旁就是有名的黑石，上书“在云流水”，以及各种地质院校，系级留下的诗。不过最有意思就要数1933年一个东北人的石刻了。巍然八个大字：“国破家亡，何寿有之”，小字：“九一八二周年避寿于此”。

思潮如涌，把我带到了三十几年前：北京的一个年轻的东北籍大学生骑着毛驴来到了温泉，登上此山头，俯瞰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想到东北沦陷，骨肉分离，眼前的华北平原，西山雄脉又朝不保夕。天色阴沉山风紧疾，枯枝朽木在寒风中瑟瑟作响；青年悲愤欲绝，握椎挥锤打下了这八个大字，同时也把它铭刻在心头。呜呼，何寿有之，我那降生的茅屋也许给日军焚烧了，我那亲生的母亲也许给日寇虐杀了，我那嫡亲的胞姐也许给日寇奸污了，国要破，家要亡，我何寿有之！

我深深钦佩这无名的热血青年。沿着公路离开温泉再走十余里路就到了大觉寺，这曾经是一个相当著名的庙宇，而现在却彻底破落了，但建筑依旧，为北京林业机械设计所所用。寺内的玉兰花（春天开）和七叶树是罕见的，听说郭沫若也来赏过玉兰，十分遗憾，几乎在所有的游览胜地我都要碰上这位“浪子”。

大觉寺南面还有一莲花寺，但天色已晚只得止步。大觉寺后面有一小山峰，虽严冬已至，但上面依然苍松翠柏，显得十分秀丽，因为像一个亭亭玉立的青鹭，故名鹭峰。鹭峰之后横着一条大山脉，在晚霞夕照之中，可依稀有看到一座宝塔，传说当年杨六郎兵败被困于此，手下只三四骑，晚上六郎虚设红灯，几骑人马提着灯回绕着塔转悠，使得辽兵不知虚实，当晚不敢轻举妄动。次日晨援兵至，杨郎得救，故此塔命六郎塔。塔下有一泉水，相传是六郎战马所刨，故名“马刨泉”。

这些传说都是一位北京的中学生给我讲的，我与他一同等车，他就给我讲，指着46路路牌上的站名一个一个讲了。

传说韩家川是辽时名将韩昌驻地，而亮甲店则是杨家将亮甲之处，东北旺，西北旺是余太君想六郎心切东北望西北望故命之。黑龙潭风景秀丽，一潭池水黑红黑红。自然这些传说都不过是传说而已，但却为西山景色增添了风采。

今天去参观卢沟桥，从广安门乘39路车过丰台路口不久就到了卢沟桥。桥长一百来米，宽不过六七米，已经相当陈旧了，单凭桥头乾隆御笔“卢沟晓月”和这石桥本身已实在无甚趣味了，桥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与伟大的抗日战争而联系。从桥上望去，永定河几乎都干了，河滩上摆满了小石头堆成的口号，“毛主席万岁”，“革命万岁”，“长征万岁”，“抗日英雄永垂不朽”。一队队进北京和离开北京的长征红卫兵战士路过卢沟桥，他们抄写着石碑上关于抗日的记载，抚摸着桥上的石狮，读着书写在大桥石栏上的标语“打到美帝国主义”。历史和现实，在此地如此融洽，融合于一个统一的民族精神，统一的反帝精神，一个伟大的革命人民的灵魂毛泽东思想。

12月9日

参加了学校的斗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猖狂反扑，林院李洪山带头向中央文革猖狂进攻。他们攻击陈伯达，江青、康生、戚本禹、关峰；农大附中伊林、涤西也发表了致“林彪”，攻击林副统帅。全北京市都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大字报，大字标语，甚至天安门前都贴出了“把毛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人揪出来”的标语，隐射林副统帅。这股风十分强硬，看来关于中央文革的大辩论势不可免。最近北京又出现了许多“黑组织”，乱打乱砸，武斗十分严重。

12月9日：写大字报“李洪山与井冈山”

12月10日：写大字报“在野的在野派的不平”

12月13日：写“‘井冈山’休欺人太甚”

因为写了几张大字报，挨了不少臭骂，同时也得到了不少支持。既然露了锋芒，那就必然招来仇恨与赞扬。激烈的战斗进一步把我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去，这与袖手旁观完全是另一种滋味。

我应该举笔为枪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中去，彻底丢掉“怕”字。怕什么犯错误，怕什么旁人

的耻笑，在激烈的战斗中我失掉的只是自己一切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风格，旧品德，而得到的却是大锻炼，大提高。

在战斗中，我发誓要无畏地前进！

1 2 月 1 6 日

正式参加了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并贴出大字报“造反派与造反派的平方”。在战斗中，自然要紧张得多了，但充满了战斗的欢乐。晚上通宵战斗。

1 2 月 1 9 日

我们兵团对井冈山的“红老虎”、“毛林陈之兵”，对红联军的“虎山行”发起了猛烈的反击，并且缴获了乔兼武的又一份反革命内部传单“谈至林彪公开信的大字报”，于 1 8 日晚 7 时兵团伏虎团将他扣押，1 9 日凌晨 2 时半扭送公安局。

“井冈山”，“红联军”等反叛不择手段，终于走上了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犯罪道路。这几天又写出了：

“彻底批判反毛泽东思想大毒草‘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批判提纲’”

“浪先生不祥的预言被证实了”

“周培源先生和收集炮弹的‘造反派’”

皆以红旗兵团“横扫千军”名义发表。我不善于写正面论述的文章，写出来也气魄不大。我却能写小品，善于揭露，分析。这几天每晚写大字报至深夜 2、3 点，平时每天睡四、五小时。奋斗其乐无穷。

1 2 月 2 4 日

几天以来，乔兼武，杨炳章，张芝，杨勋先后被公安部扣捕，红色造反台被封，“井冈山”、“红联军”总部被封，北大的伪“造反派”已经全线崩溃。尽管“保皇”被搞得很臭，但北大的“保皇派”却大胜了。我因为写了一张大字报“井冈山与李洪山”，震动了井冈山总部，招来了一场围攻，“扬子浪”“浪先生”的名字也传遍全校了。

起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

我所属的红旗兵团“横扫千军”战斗队，直属总部。受总部委托起草各种声明、通告、评论员、观察家文章、大会发言，并接受命令专门撰写各种针对性的大字报。

战斗队里的几个同志，虽然只有相识十余天，但影像却十分深刻，他们都非常富于特征。徐云辉，物三女生，四川人，并不泼辣，也不善言辞，平易近人，谈起话来，娓娓动听，显出十分善良的样子。她经常兴趣盎然，羡慕地听别人谈话，在这一点上她与于静蕾是十分酷似的。王复兴，史一，北京人，校田径队员，野兽性很足，有些愣，爱好吵架与动手，自尊心强，也是一个思想深刻兴趣广泛的人。黄虹坚，文一的女生，广东人，绰号小广东，但讲得一口十分洪亮、泼辣的北京话，是我们兵团的职业演说家，优秀评论员。一天到晚无忧无虑、蹦蹦跳跳的，对所有的人都毫不客气，有时甚至有些嚣张跋扈，是一个十足的活跃人物。他所有的感情面，最多的是鄙视的感情，几乎都在脸上显露无遗了。甘斗，哲五学生，十足的书呆子，一天到晚趴在桌上写文章，十分顶真，是一个老实人，经常受恶作剧的小广东欺负。所有的人都称我为扬子浪，或者浪先生。

关于黄虹坚又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2 4 日晚上十点，黄虹坚兴冲冲地跑到 3 5 楼去敲徐云辉的门。硬把徐云辉从床上拉起来，“快去找魏秀芬去问他要录音带”，她俩到了哲学楼，魏秀芬不在，就回出来了。但刚出哲学楼的门，黄突然晕倒了，吓得徐云辉马上把她扶到医院，在医院里又给打了一针，黄还嘻嘻哈哈与医生护士又打又闹。从医院出来夜已深了，黄、徐还有一个女同学三人走到了 2 7 斋门口，黄突然不省人事的昏倒了，而且再也不醒了。无奈徐与另一个女同学一人扛头，一人扛脚，把这个沉甸甸的小广东抬回了 2 7 斋，当晚就送进了医院。据大夫说没有什么病，只不过经常不吃不睡地累倒了吧！

1 2 月 2 6 日

今天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诞生 7 3 周年，我和全国革命师生，革命人民一起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领袖。全世界和他同时代的所谓伟大人物与他相比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侏儒，是他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是他英明地解答了现实的问号，为全世界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是一个使太阳都黯然失色的人物，一个握着历史缰绳的高超骑手。学习毛泽东，跟着毛泽东，仿效毛泽东去创造自己红色的历史。

大风大浪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来的，跟着毛泽东，在大风大浪中杀出一条血路来，誓死也要把历史推向前进。

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大发动，天塌不下来，地陷不下去，任凭世界上出现什么风景，什么灾难，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照样前进，革命照样发展。

一九六七年

1 月 1 日

难忘的 1 9 6 6 年过去了，更加伟大的 1 9 6 7 年到来了，1 9 6 7 年革命的风暴将吹得更加猛烈，大动荡，大搏斗将进一步发展，整个旧世界都将受到最猛烈的冲击。谁能预料 6 7 年会发生什么呢？历史的趋向尽管谁也不能改变，但迂回和曲折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务必提高警惕，以最敏感的政治警惕性去迎接这场伟大的斗争。

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我一定要更加无所畏惧的前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在政治斗争、革命造反的伟大气势上狠下功夫。在新的一年里我还要更严格的要求自己，既不作形行浪迹，不拘小节，任意放纵自己的纨绔子弟；也不做谨小慎微，前怕狼，后畏虎的凡夫俗子。要以毛主席为榜样，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时以百倍的努力磨练自己的革命意志，开拓自己的广阔胸怀，提高自己的斗争精神。同时还要努力克服学生气，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学习鲁迅“咬筋”和“韧”的精神，彻底消灭一切颓废、苦闷、无所作为的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永远奋斗、永远进步。

在新的一年里，我要积极走向社会，走向工农、走向革命。我应该踏上长征的路途，我应该下矿井，去工厂到工农中去吸收最丰富，最深刻的营养，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我的口号是“滚一身泥巴，沾一身油污，染一身血迹”坚定地沿着毛泽东为青年开辟的道路前进。

在新的一年里，我还要坚持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努力锻炼身体，准备承受战争与革命的考验。我要跑步，打球、游泳、登山、远足、游览，培养健康的业余兴趣，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让资产阶级名利欲念去见他妈的鬼吧！我健康的精神与体魄决不容许你肆意毒害。我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提高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学习调查研究，学习各种社会科学。我要进一步读马列主义的精典著作，还要学习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现代史。同时还要抽空看外文，不让学业半途而废。还应翻阅各种书籍，对资产阶级思想调查研究准备反戈一击。

我还要广交益友，从周围的革命同志中吸收营养，到战斗的集体中去磨练陶冶自己，决不肮脏沉闷的斗室随波逐流。

我正处在年青时代，我一定要从现在就把生命投入生活，投入斗争，投入革命。同时还要为将来准备，更严格，更全面更深刻的锤炼自己，准备迎接中年，晚年的斗争生活。迎接战斗，迎接世界大革命。长江前浪推后浪，一泻千里的扬子江，将就是我心中最伟大的形象。让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胸怀，我的品格，都象那广袤无边，奔腾向东的扬子江一样吧！我要永远发挥扬子浪的精神，永远在奔腾的长江中翻滚，向着东方的太阳，向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奋勇前进。

除夕之夜，我们“横扫千军”9 个人与“红旗战报”编辑部和总部的一些人在甘斗的寝室里开了一个新年晚会，十分成功。碰到晚会我照例出洋相，不过也有进步，以前照例是要赖不出节目，现在也敢干着嗓子，喊一只最普通，最流行的歌子了，而且也无甚羞怯了。

战报编辑部的史定谷与俞颖特别像，聪颖，矜持，也活泼爱玩如出一辙，而且身体面容举止也十分雷同。

这些同学都是出色的，比起另外一些人来，胸怀、精神、思想要开阔得多，深刻得多、高得多。与他们相交，共同作战比起与另外一些人鬼混不知要好多少倍。我热爱“横扫千军”，我要为它的巩固而努力，以“横扫千军”的组织形式去工厂、去长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今天首都26所高校联合举行游行宣传活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喊声震撼了古老而又雄伟的北京城。

1月2日

元旦，首都26所高校联合行动，在北京市举行了盛大的宣传游行活动，我也参加了这次运动。

1月3日

我完成了三千多字的文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再版）在近几年的阶级斗争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较有质量。

翻阅了古达瓦达纳的大文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3]，阶级斗争是何等残酷啊！在左右两派作生死搏斗时，终然右派完美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而左派却有一万个缺点，但任何革命者都必须坚定的支持左派。

我一定要彻底解放思想、甩掉家庭包袱，我该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让别人去议论好了。历史上哪一个革命者不是在敌人的恶毒咒骂声与哈巴狗们轻蔑的狂吠声中成长起来的。如果害怕议论而不敢行动，就是最大的懦夫。还是好好想一想父子俩与毛驴的故事吧，为别人议论所左右的懦夫，是多么可悲而又多么可怜啊！

……我们也遇到过许多肮脏的争吵，虽则从没有像你所遇到的那样肆无忌惮…顺便说一句，人不应当忘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制造历史的人是不应当怕弄脏自己的手的。”

1月6日

生物系诡辩家樊立勤在今晚的辩论会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作了一个十分折中、十分公允的讲话。放冷枪，射暗箭，矛头针对校文革，针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由于某些原因他的讲话获得了很多的掌声，一些前“造反派”们疯狂的为他喝彩，为他鼓掌，盛况绝不亚于谭立夫的发言。当时把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时勇气倍增，拼命挤上台去，大叫樊立勤发言是大毒草，必须批判，并作了简短发言。这是我的第一次上台辩论，但决不是最后一次。

真是艺高胆大，无私才能无畏，只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才能消除一切卑怯懦弱的恐惧，才能大长革命的勇气！

1月8日

今天写了一份大字报“一代风骚樊立勤君可以休矣”质量还比较好！晚上横扫千军本来准备讨论红卫兵的问题结果议决回到系里去讨论。

我当然希望参加红卫兵，但一时条件不成熟，不参加也未尝不可。反正现在中央没有明文的规定，将来如何发展不得知，而且目前的红卫兵最本质的条件还是出身。两个根本对立的队伍，都有自己的红卫兵，就是大方向完全错误的红卫兵也是红卫兵，因此红卫兵将来是必然要整顿的。

我到不希望红旗红卫兵第一，二批就吸收我，缓一些会好一些。

今天看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受到）教育很多。《多余的话》基本上都是实话，临死吐真言，瞿秋白暴露了他共产主义叛徒的真面目。他可耻地否认了自己曾有的言行，对敌人卑躬屈膝。他对自己的分析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文人的忠实写照，这样没有骨气，这样没有羞耻，简直是共产党人最大的侮辱。瞿秋白就是应该暴尸三天，鞭答三百，就是这样也解不了恨。但反过来说应该把他的尸首扔到山沟里去，不要让人沾污了耳目，想到有这样一个卑鄙、软弱、可怜、无力的人，简直令人恶心！

1月9日

今天人民日报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同时发表了极其重要的编者按。这是一个大事，他预示着文化革命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热烈欢呼：全国继续澎湃的工人运动好得很，好得很。

1月10日

晚上看文汇报，被报纸所洋溢着的澎湃的革命热情所激励，当晚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篇稿子“最最热烈欢呼全国又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完后读了一遍，同志们个个都称好，建议送人民日报，但因故未送成十分遗憾。当晚我建议我兵团接管“北京日报”，王复兴十分赞同，密谋策划了一回，但因没有摩托，因此未能得逞。

1月11日

上午我们去北京日报与少数派“星火”挂了钩，广播了“北京大学毛泽东思想红旗兵团”致北京日报革命造反派的公开信。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北师大井冈山先来了一步。公开信也是我写的。

1月12日

晚，广播了中央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贺电，全国更加大乱了，北大的军训搞不下去了，只能暂缓！文化革命最伟大的功勋就是它表明了文化必须革命，革命必须前进，这是历史的宣言。

1月14日

军训正式暂停了，全校骚动，纷纷准备出走，在“横扫千军”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看来只能与小广东、徐云辉、老金等分离了。徐云辉对我说：永别了，杨子浪！或许永别了，但不要遗憾，人生变化无穷，我会遇到新的充满理想光彩的人的。但回忆还是有益的，与小广东相交一月，她的形象的夺目光彩，别具一格的泼辣、大方，甚至目空一切的狂妄，都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参加“红旗”有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来如鱼得水，觉得物尽其用了。写了几篇质量较高的大字报，出了几个主意，耳朵里充满了赞扬声。什么“象爱因斯坦一样致力于理工，但学识十分广博的人”，“杂家”，“中毒很深”，“脑瓜子很灵，鬼主意很多”，“有上海人的基础，念了几年数学鬼主意就越来越多”等等。我的工作受到了广大范围的赞扬，很多文科系的同学都对我的政治、文学水平表示赞扬，于是乎越干越起劲了。但是在另外一个环境，没有熟人的赞扬，没有女人的青睐，没有名声的地方，我能否坚持默默工作呢？这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一定要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

我应该自责，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弱点太多了，我精神上的软弱与漏洞太严重了，任何一个认真的有力的敌手，都能轻而易举的攻跨我。思想上没有改造好的人，在政治斗争中决不能永胜。

文化大革命是最伟大的课堂，它训练了几千万的阶级斗士，经过文化革命大风浪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必将成为未来世界最优秀最伟大最勇敢的民族，对于未来我寄托着无限希望。13日我到《促使北京日报新生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作。

1月15日

今天北航红旗一些同学对联络站的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下午开讨论会统一意见，看来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有些分歧。从下午的讨论中我们觉得北航红旗不愧为一支久经锻炼的左派队伍有很多优点值得学习。

1.首先是敢说敢想敢干的彻底革命精神，敢揭发矛盾，决不隐藏矛盾。就是革命造反派内部他们也决不以退让和掩盖矛盾求团结，大胆的揭发矛盾进行批评。

2.他们有很好的科学精神，能高瞻远瞩的进行分析，能顾全大局，对形势有清醒的估计。

3.他们能充分发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革命造反派内部能畅所欲言，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达到真正的思想统一，真正调动起广大同志。

这几天困在北京日报社内，把我浑身的精力与锐气都磨掉了，烧得热哄哄的暖气，与我振奋的精神大相径庭，四肢懒洋洋的，老想睡觉，这真是一栋修正主义的大楼。

（未完待续）

~~~~~

## 【史实辨析】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 邱路光 •

电子杂志《昨天》在37期上登了一篇程光的《邱会作家书》简介，（内容见“关于《邱会作家书》的对话”，z k l 4 0 8 d——编注）因为所载内容严重失实，作为邱会作的家人，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程光文中提及的事情予以澄清。

（一）

程光在《邱会作家书》简介中说，“父亲于公审前几个月在狱中写的被偷带出来的短信，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依法审判，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这封短信，是我们探视父亲邱会作时，我带出来的，这次探视程光并没有去。父亲的信中并没有“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依法审判，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这些内容。

探监这个故事我先讲一讲，也算一段史实吧。

公审是1980年11月20日开始至81年1月25日结束。此前，黄永胜伯伯的长子黄春光不断写信要求见父亲。黄伯伯在文革中已经累病了，肝区经常作痛，现在八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没有想到，黄家的要求得到了批准，他们从广州北上，春光给我写了一封信，约定在河南安阳火车站见一面，我们也八年没有见面了。我当时的驻地离安阳还有几十公里，我提前到达了火车站，我和春光及他的几个弟弟在车站见面了，他们没有来得及下车，话多时间少，春光又着重讲了几句怎样给上面写信的事。我和春光从穿开裆裤时期就是最亲密的朋友，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出生，春光小名叫冬洞，是在躲避敌人的扫荡中，冬天在山洞里生的；我叫路光，是父亲母亲从新四军回延安的路上生的。我们都长在红旗下，经历了共同的幸福成长，也经历了共同的坎坷、磨难。当火车在严寒中开动，一股白蒸汽罩住火车而消失时，我的眼泪刷刷往下流。

此后，我也按照春光提供的方法给上面写信，结果也得到批准，公安部有关部门还发来书面通知。

可以探望父亲的消息，我立即告诉了所有弟弟、妹妹，当然也包括程光，程光没有来。

秦城也是不通公交车的，只能坐车到小汤山，然后步行，而且有一段不短的砂石路。我拿着介绍信，经门卫联系进了两道门，两道门是有卫戍部队和公安部队分别守卫的。进秦城监区是一个拱形的大门洞，接洽人黄妙玲同志在这里接待了我，黄妙玲是个女同志，瘦小精干，戴一副黑框眼镜，态度很好。她讲了一些规定后，特地嘱咐我说，你父亲知道你们来有些激动，

你们要多劝慰他。

我们就是在大门洞西边的一间大房子里见到父亲。下午两点半父亲在两个中年公安人员的搀扶下进来了。我见到父亲的第一印象是很深的，他头戴一顶毛茸茸的冬装将军帽，穿了一身没有罩衣的空壳军装棉衣芯，脚穿单布鞋，每只鞋上的大指和小指处有两个洞，而且没有穿袜子。这是极为酸楚的画面。

父亲过去方圆的脸庞变成皮包骨的清癯长脸。我们扶着父亲坐下来，没有想到父亲对着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你妈还活着吗？”一个共产党的老干部竟问了这样一句话，可见他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残酷性是何等的领悟。当时我也十分感慨，我不断好言劝说父亲说母亲很好。其实那时我母亲还在陕西大荔县农场劳改。我们说话时，我妹妹一直在里里外外看我父亲穿着。令人吃惊的是，这么冷的严冬，父亲只穿一个棉衣壳，里面是一件黑色的布囚衣（没有扣子，只有短带子系住衣襟两边），我立即脱下自己的毛衣给父亲穿上，然后我对监管人员说，怎么穿的这么破呀，党的政策在哪里？！监管人员没有愠色，反而平静地说，我们反映过多次。这就是第一次探监的大致情况。

程光书中提到短信是第三次我们探监时，我带出来的，这次程光也没有去。父亲对我说：“路光呀，我的腰很痛，你看看是怎么啦？”我顺势掀开父亲的棉衣，一眼就看见父亲腰际有一个折叠的马粪纸，我一边给父亲揉腰，一边用余光看两个监管人员坐在墙角，虽然面无表情，但也没有恶意，他们也没有怀疑什么，我立即把折叠的马粪纸放进兜里。这封短信包在马粪纸里，是用从书上后页撕下来的纸上写的。这是父亲冒险准备带出来的短信，或许成功，或许失败，如失败后果不堪设想。因此父亲没有写什么更深的东西，并不像程光所说“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依法审判，更多是一种政治手段。”父亲只是在短信中坚定地说对以后将要发生的事“吉凶并重。对前者不幻想，对后者不惧怕。”后来程光来北京时说要看一看，他看完后，我说这些父亲的重要资料要统一保管，他搪塞一番始终再也没有还给我。

公审后准备安置我父亲，那次探监我母亲也去了，没有想到父亲、母亲劫后十年第一次相见竟在秦城监狱！因为我们和父亲是分别从南北两个门进到会议室的，中间隔着个大会议桌，所以父母两人分别十年后的相见连手都没有握上。探监的地方也换成较大较好的会议室，秦城监狱的第一把手（也是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即13局的领导。大个子、光头，说话坦荡）和他的副手（瘦高个子，文质彬彬）都来了，和我们协商去西安看房子及安置的事，最后决定由秦城的工作人员高大新（湖南人，人很好）和我去西安看房子，打前站。1981年9月12号，父亲到了西安，那天是中秋节，也是父亲从地狱里爬出来的第一天，房子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木板床以外，只有我用46元买的两个藤椅（那时哪有钱呀），父亲睡不着，我就到父亲的床上，我们相对坐卧，一直聊到天亮。

## （二）

下面谈谈有关胡耀邦、赵紫阳批示的问题。

程光说“1987年父亲有期徒刑到期之时，他本以为要解除监管恢复公民权利了，没想到对他却是‘维持原状’。父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实质，说这么干，就把所谓的‘依法行事’的面纱揭下来了。这里哪还有什么真实意义的法律？只有不受制约的权力！”程光说的不实。1987年是父亲16年徒刑到期，还有5年剥夺政治权利，即没有恢复公民权利。到1992年才“账”结清。87年9月24日父亲刑满时，公安部来了一个姜处长，宣布刑满释放，并发放了有关文书，姜处长心里很明白，说多关一天我们就犯法了。但下一步怎么办，他们也搞不

清。大家想想看，不“维持原状”又能怎么样？！公审是演了一场政治戏，帷幕一落就不管了，至于刑期到了怎么处理，他们可能想都没想。因此父亲他们在“服刑（保外就医）”期间，很多问题难以解决，甚至在中央各个有关部门之间都不知道应该谁来解决，更不知怎么解决。比如判刑以后，应由司法部门管，可实际上还是公安部门管；比如刑满后应由民政部门管，可是父亲的生活费还是“原渠道”出，交给省民政厅魏干事给父亲送就是了。这些情况我父亲很清楚。程光说“父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实质，说这么干，就把所谓的‘依法行事’的面纱揭下来了。这里哪还有什么真实意义的法律？只有不受制约的权力！”既然父亲很清楚就不会说这些话，这都是程光的话，不是邱会作的话。

程光说“父亲刑期结束，还要被继续非法监管之时，向赵总书记写了信，抗议对他“维持原状”的苛待。不久之后，父亲的“人事关系”从省公安厅监管部门转到省委老干部管理局，他住进了干休所，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程光的话，并非事实。这里，真实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也被关押起来，1983年安排我复员回了北京，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经过万里伯伯的批示，经过叶子龙伯伯、安林伯伯（北京市副市长）等人的帮助，我在北京商学院当了一名教师。1986年8月，我被出租车撞成八根骨头骨折的重伤住进海军总医院。当时我生活处境很困难，更没有住房，根本无法养伤。我在困难无告之时就给时为党的总书记的紫阳伯伯写了一封信，没有想到喜从天降，1986年12月12日，总书记做了批示。

1987年初冬，我在国管局分到了住房，但是什么家具也买不起，只得慢慢积攒。到1988年我的住房已经基本可以住了，我就把父亲接来了。那时我在北京商学院教书，下了课就骑着车子往家跑，给父亲做饭。每个星期我骑着自行车带着父亲到双榆树大澡堂子去洗澡，洗澡还要排队等号，生活条件非常艰苦。1989年春节全家聚在北京，就是挤在这个房子过的。春节过后，吴法宪伯伯到北京没有地方住也在我这里，父亲和吴伯伯一起聊天，一起练字，一起散步。“六四”的时候，父亲和吴伯伯也在北京住在我这里。程光说父亲刑满到期后还“继续对父亲他们进行监管，直到他去世前。”“六四”这么大的事，如还是监管，早把他搞回西安了。况且，我父亲几次来北京住在我这里，几次去武汉住在我妹妹那里，去过石家庄住在我小弟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半年，甚至一年，从没有“对父亲他们进行监管”。

父亲的确给赵紫阳总书记起草了一封信，但根本没有发。所以从源头上说，后面因赵紫阳改善了生活的事自然是没的。父亲向赵紫阳写信和父亲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链接”是不存在的。1988年底，紫阳伯伯的子女悄悄来看了父亲，时间很短，谈的也谨慎。事后我对紫阳伯伯的子女说，我父亲想给总书记写个信，回答说：不要写，子女的问题尽量办，其他不要提。我和父亲都心领神会，不说自明。

再说说西安的情况。1987年我父亲刑期到了以后，一是因为还有5年剥夺政治权利，二是因为公安部不知怎么办，西安更不知怎么办。公安部明确的说到期一定要发释放证，这是法律问题，原则问题。今后公安部门不能再管了，下步怎么安排，等通知，这样名义上转到民政部门。实际上父亲也没有什么要管的，一个是发生活费，一个是报销药费。这个时期他们管理混乱，是父亲生活最困难的时期，看病，医疗费用，生活费用都理不清头绪。

下面是很重要的情况：黄（1983年已故）吴李邱的子女是很熟悉友好的，各自父亲的生活情况也经常通气，或叫着“互动”吧。邱会作第一个刑满到期，邱刑满到期后的生活状况直接影响到吴、李。如上所述，邱的情况引起吴、李两家的重视，吴法宪89年刑满到期，他88年给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伯伯写了一封信，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赵紫阳真是大

恩大德，他批了，批给乔石；乔石批给公安部长王芳，结果王芳顶了。这时赵办还在继续努力，赵办给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打了电话说明情况，姜春云办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办得很好，89年9月吴法宪刑满到期，住进了一栋新盖的二层小楼，山东还接受陕西的教训，干脆将吴法宪由省委老干局的干休所管起来。

我知道山东的情况后，向陕西反映，经向山东了解咨询后，陕西省委也决定邱会作由省委老干局管理，这是91年的事了。这样就解决了以前对父亲的管理混乱。

把父亲，把（黄）吴李邱按上莫须有的罪名，打击、关押、公审、判刑，最后还是党“捡”了起来，“捡”了起来，管了起来。1991年陕西还发了《陕老干〈1991〉32号》文件，大大提高了父亲的生活费（原为每月200元，刚到西安是100元）。陕西省委也积极给父亲找房子，1992年搬了进去。

1992年9月，父亲写信叫我去西安，说省里在省干休所给他一套房子，有暖气，每个星期放一次热水，问我搬不搬？我看了房子回来后说坚决搬，并说怕夜长梦多，情况有变，要抓紧搬。第二天我就和四医大的一个朋友小贾，借了个大皮管子，把房子上下统统冲了一遍，这个房子常年没有人住，落满很厚的灰尘。然后我就买了最便宜的地板革铺上，并到电信局申请了一部电话，想办法搞了一个煤气罐。搬家都是用三轮板车，拉了十几车才完事。

1998年陕西省委又发了“陕老干（1998）22号”文件，给父亲配了一辆红旗车，这是时任省长程安东批示的。

总之，邱会作给赵紫阳写的信并没有发出，赵紫阳也没有对邱会作批示过；邱会作到1992年才搬进干休所，生活条件有改善，那时赵紫阳已被撤销职务三年！因此，实事求是地说，邱会作的生活改善主要是到1992年父亲16年徒刑及5年剥夺政治权利都到期后，中央一种“势在必行”的安排。

### （三）

下面再谈谈胡耀邦批示的事。

程光说“胡耀邦直接批示，让我母亲结束‘终生劳改’，返京复查。”

可以明确地说，耀邦伯伯没有给我母亲做过“直接批示”。但是耀邦伯伯对我母亲有极大的关心，耀邦伯伯对程光、对我妹妹京京，对我弟弟毛毛都有批示。我们全家非常感谢耀邦伯伯！

打倒四人帮以后，最高兴的应是“九一三”后受株连的人，盼望党能落实政策，中央对“九一三”后受审查的人也有实事求是作出结论的要求。可是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负责人并没有实事求是，而是严酷整治，他把黄吴李邱的夫人都“三开除”（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开除公职），按敌我矛盾押送农场监督劳动，每月只给生活费30元。78年夏天我母亲被搞到陕西大荔县农场。同时，所谓有牵连的黄吴李邱的战友、同事、部下很多都是三开除；这些人的子女，包括黄吴李邱的子女不许按干部转业，要按战士一样复员，不许回北京，回了北京的要分在郊区农场。

1981年公审以后，黄吴李邱保外就医，再一次复审黄吴李邱夫人的问题，要求落实政策也势在必行了。但总后给母亲下的结论比上一次错误的结论还厉害，不但维持了原来的结论，还把母亲连降三级且降为地方15级，勒令母亲“到西安和邱会作生活在一起”。我去总后给母

亲领工资时，财务人员都直摇头，因为军队无权给我母亲定地方15级，只有处理我母亲转业到地方后，地方组织给我母亲定地方级别才顺理成章。当时财务人员无可奈何，只能参照地方15级发给我母亲工资，多余部分暂存在总后那里。

我们当然是不屈不挠。1983年母亲又来到北京，并给耀邦同志写了申述信，耀邦同志并没有“直接批示”，他知道军队的事情十分复杂，不是批几个字就能解决问题的。况且公审不久，做事是要慎重的。程光说的不对，而且时间也不对不上。

母亲给耀邦同志写信不久，全国开粮食工作会议，耀邦同志到会讲话，他看见我父亲的老战友商业部副部长张永励和赵发生参加了会议，会后就把他俩留下来。耀邦深情地说（大意）：邱会作你们很熟悉，我也很熟悉，胡敏给我写了信，我请你们关心一下胡敏的事情，并请你们带去三句话，一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二要向前看，三我认为我们党的圈子不要搞这么小，要搞这么大（用手把双臂张开），一定要多团结人。会后，两位部长伯伯就找我妈妈，张永励在我小弟弟的家里（在半壁店的汽修十五厂，仅一间小房）找到我妈妈，张伯伯看见我妈妈这么凄惨，立即拉我妈妈上他的汽车就住到武定侯胡同他家去了。赵发生伯伯则直接去了总后，找到总后负责专案的副政委李耀，没有想到总后不但不买账，他们知道耀邦同志关心胡敏的事，就抢时间仓促给母亲又下了一次结论，不但没有落实政策，还在结论中说母亲坚持错误，“并通过找熟人找关系，企图解决问题”。给党的总书记写信，竟成了找熟人找关系？！耀邦同志对母亲的关心竟成了“祸事”，他们叫我母亲去谈话。我陪我母亲去总后谈话时，总后司令部管我妈妈专案的参谋阎景乱指着我母亲的鼻子狠狠训斥，“他妈的他妈的”口带脏字。

我母亲落实政策的事还很漫长，后来军委张震副主席，军事科学院段苏权政委，总后傅全有部长，总后杨德清副政委，总后纪委彭刚副书记，总后政委刘源上将等等，都对我母亲很关心，我代表全家深深鞠躬感谢。

我们小结一下：程光所说关于胡耀邦、赵紫阳批示的事，都是没有的。胡耀邦、赵紫阳是我党两届总书记，他们做过的事一定要认真搞准确。尤其是对黄吴李邱做过的事更要真实准确，因为这关系到当时中央上层对黄吴李邱的“政策”问题和认识问题。

耀邦伯伯没有给胡敏做过批示，但耀邦伯伯给程光，给我妹妹，给我小弟弟都做过批示。耀邦伯伯还给谢富治的女儿谢小沁，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等做过批示，给予极大的关心，甚至改变了坎坷的命运，我们都感谢耀邦伯伯的大恩大德！耀邦伯伯强调不能正确地对待我们这些子女，就会“把我们推到敌人那边去”，不敢解决我们这些子女的问题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紫阳伯伯没有给邱会作做过批示，但紫阳伯伯给我做过批示。紫阳伯伯给吴法宪的信做过批转，还给林彪的女儿做过批示调回北京，给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做过批示调回北京，给黄永胜的三儿子、四儿子做过批示分配住房（他们只分到一居室。后来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来北京开会时还对林若说你们小气了，大方一点嘛！）我们同样感谢紫阳伯伯的大恩大德！

胡耀邦、赵紫阳是政治家，他们关心我们并不是认为有什么“不当”，而是以他们高尚的情操和博大的胸怀，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我们以关心，不要搞株连，改善一下我们十分困难的生活条件。因为他们是无私的，他们是在为党的事业争光。胡耀邦、赵紫阳不会在政治上失衡，去帮助邱会作、胡敏及黄吴李邱的子女。况且胡耀邦就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组长。

#### （四）

程光《家书》前言中还说“公审后把父亲安置到西安，继续让他过着艰苦、屈辱、某些条

件甚至还不如监狱的生活。以至于父亲在要求改善生活无果的情况下，说吃不消这样的‘保外就医’，要求回到秦城监狱去。”这也是严重不实的。邱会作自踏出秦城监狱的那一刻起，从来就没有“要求回到秦城监狱去”！

大概是1982年10月底，公安部来巡查黄吴李邱的安置情况，在省公安厅一个副厅长的陪同下到了我们的住处，带队的就是秦城的一把手那个高个、光头的局长，我当时也在场。这个局长说他四个地方都去了，基本上算安置下来，但条件各异。我父亲只提了两个条件，一个是住房没有暖气；二是没有坐便，蹲着解大便很困难，放个小凳子勉为其难，希望能换一个有暖气的住房。这个局长说（大意）：你这里没有暖气，的确是个问题，但你这里住房最多。房子是不能再换了，买这个房子都找到省里领导才办成。有困难我们慢慢克服，我相信会越来越好，要有信心。不久，省公安厅就给家里安了一个小锅炉，安了土暖气，拉了一车煤。可以说取暖问题凑合解决，但烧暖气、抬煤上楼、清煤渣搞得不亦乐乎。第二年就撤了小锅炉，垒了个砖炉子。

1992年，邱会作的“账”全部结清，发了身份证，上了户口（户口本上明确写了公民的权利），邱会作又变成公民！公民是当时邱会作的基本特征。“曹营的事难办呀！”狠狠整了二十一年，吃了这么多苦，怎么人还活着？！难办也要办呀，我们毕竟是共产党。程光说，“父亲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直到快去世前，不得不让子女帮着养老”，这也是言过其实。父亲是给子女写过一封信，这封信是我起草，父亲照抄的，父亲修改过的底稿还在我这里，父亲、母亲知道我对他们的赡养负担不小，二老心疼我，为减轻我的压力而起意的。1992年以后，邱会作的生活条件，逐年改善。尤其是1991年归省委老干局管理后，生活费逐年提高，1998年还买了一辆红旗车，住医院也是住大套间，药费实报实销，还安排我父亲去延安旅游。这时，尤其是临去世前父亲没有“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况且我们五个子女，包括程光在内都对父亲、母亲的生活尽了力，甚至常有几个子女重复购置的情况（如毛衣、外衣）。2002年我父亲重病，陕西省委是很重视的，去北京治病是省委研究批准的，来北京之前父亲的生活费就增加到每月3000元，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两个月花了几十万，我们对陕西省委，对省委老干局，对省委干休所是非常感激的。就是现在，父亲已去世十二年，省干休所每年还来看望我母亲，并给慰问金。

只是父亲死了，问题就来了。陕西、北京都不知道邱会作应该“怎么死”！最后竟然重新回到中纪委中央两案办“统治”邱会作。公审都过去二十多年了，二十一年前中纪委的党内审查已经结束后，宣布对黄吴李邱补办逮捕手续，这时已脱离中纪委的党内审查，进入司法程序，接着交最高检察院特别监察厅审理后向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提起公诉，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了，并判处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怎么经过二十一年的苦难，又回到中纪委了？终点又回到起点！这不正说明公审是演了一场闹剧吗？！中央两案办立即对邱会作的死下了“五不准”的指示（不是程光说的六不准）。

中纪委对陕西省委有一个“关于邱会作的丧事活动的批复”，即《中纪〈2002〉12号》文件，文件规定：

“1、不准开追悼会和遗体告别；2、不准发生平简介，发讣告；3、不准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4、媒体不发消息，不邀请新闻单位参加活动；5、费用要按照有关规定办理；6、不要造成负面影响；7、应家属要求，骨灰自行处理。”

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遗体告别，不准发生平简介，不准发讣告，不准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就是社会流传的五不准，“不准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就是说连自己家里设灵堂都不准。最令人不解的是文件规定“应家属要求，骨灰自行处理”。好像父亲的骨灰是属于中纪委的，只



是家属要求了，他们发了善心把骨灰交给我们自行处理。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程光的《家书》前言中，引用的邱会作的几段“原话”，都是以他的话为主，加上我父亲的话，是合成的，冠以邱会作的口气说出，因此都是不实的。比如程光说“父亲说了一句话很是让我记得，‘维持一个冤案，比制造一个冤案祸害人更多！’”如果我没有弄错，这是从英国哲人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演化过来的，经过程光改编演绎，成了邱会作的箴言。邱会作是个老粗、工农干部，根本说不出这种话。

□ 摘自《共识网》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